

1999 - 13

おまけ

1999年(平成11年)2月5日

社会経済生産性新聞

新刊紹介

『選択・責任・連帯の
教育改革』

堤 清二、
橋爪大三郎著

社会経済生産性本部が昨年七月に発表した社会政策特別委員会の教育改革に関する中間報告書「選択・責任・連帯の教育改革」学校の機能回復をめざして」をもとに編集された岩波ブックレットの新刊が発売された。

同報告書は、現在の学校は「教育の場」としての機能を失い、その原因は学校

生徒・家庭間の「連帯の欠如」にあるとし、小中学校の学区制の廃止や大学入試・定員制度の廃止、大学入学後の成績が基準に満たない者を留年・中退させる「キックアウト制」の導入などを提言している。

本書は、第一部でその報告書の内容を紹介し、第二部で同委員会の委員長である堤清二・セゾンコーポレーション会長と同委員会専門委員会の委員長である橋爪大三郎東京工業大学教授による対談「一人一人の個性をみる教育」を展開している。対談で、橋爪氏は「ぜひ受験をなくしたい」と強調、堤氏は「教育は、人間

『二十一世紀』 第54号 pp.53-59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1999.8発行

跨世紀的中日關係

——回顧近代日本の對華政策

● 橋爪大三郎

日本與中國不僅地理位置十分接近，而且在歷史上也有着悠久深遠的往來關係。進入新世紀後的中日兩國是像過去的法國與德國那樣，國境相鄰卻視對方為宿敵而相互爭鬥呢，還是像隔洋相望的英國和美國那樣，即使偶有交戰，也以維繫一種永續不變的和平關係為其基本宗旨呢？當然，我們都希望出現後一種狀況。為實現這個目標，中日兩國必須作出一定的努力，勇於面對並積極跨越目前仍處於曖昧狀態的歷史遺留問題。

為此，我們有必要先回顧一下本世紀以前的中日兩國關係，進而展望二十一世紀的中日關係。

一 即將解體的中華帝國與新興國家日本

二十世紀初，古老的中華帝國面臨被解體的生死關頭，正好與憑藉明治維新而成功脫離舊體制、日益興盛的日本形成鮮明的對照。隨着中日在朝鮮半島的衝突不斷升級，1894年終於爆發了中日甲午戰爭。這次戰爭既體現了兩國在朝鮮權益上的對立矛盾，同時也反映了中日兩國相互衝突的世界觀。

清朝政府無法從其中華大帝國的傳統世界觀中脫離出來。這種世界觀認為，中國是世界的核心，周邊國家均是屬邦；通過向中國朝貢而形成的「夷夏秩序」是其根本。儘管出現了實力遠超中國的歐美列強，但是，正因為對西方的不理解，中國反而更加拘泥於其所固有的世界觀。日本則很早就意識到那種以中國為核心的世界秩序是不合理的，因此，一旦有了和西方文明接觸的機會，日本就開始明治維新，其目的無非是創造一種強有力的政治領導態勢，使日本成長為足以與歐美諸國平起平坐的近代化國家。然而，日本要成為西方意義上的獨立國家，首先就必須獲得與中國對等的地位。因此，中日兩國圍繞朝鮮半島支配權而產生的各種衝突，也可以說是一種歷史的必然。

日本很早就意識到，那種以中國為核心的世界秩序是不合理的。因此，日本要成為西方意義上的獨立國家，首先就必須獲得與中國對等的地位。因此，中日兩國圍繞朝鮮半島支配權而產生的各種衝突，也可以說是一種歷史的必然。

日本以明治維新為契機，完全捨棄了原本就徒有虛名的儒教，以西方化的國際政治原則重新認識東亞局勢。朝鮮則截然不同，仍恪守儒教原則，絲毫不理解近代化的必要性，因此，極有可能會淪為某個列強（如俄國）的殖民地。為了防止朝鮮半島一旦成為外國的殖民地而威脅到日本的獨立與安全，日本認為應該先下手為強，以擴大自身的影響力。日本這種一廂情願的想法，竟得到了警惕俄國東進的英美諸國的支持。

清朝政府一向認為朝鮮是其屬邦，作為宗主國，一旦朝鮮出現混亂，理所當然地應派遣軍隊加以平息，並制止日本在朝鮮權益的不斷擴張。與此針鋒相對，日本則提出自己與中國同為平等獨立國家的主張。

日本對朝鮮的處置是有計劃的：第一步先使朝鮮擺脫從屬中國的地位，繼而把它變成受日本保護並從屬於日本的國家。在中日甲午戰爭的開戰敕詔中，日方聲稱是為了「朝鮮的獨立」，而日本在戰勝後卻不斷加緊朝鮮的屬國化，並最終奪取了對朝鮮的支配權。到1910年，日本吞併朝鮮。

脫胎為近代化國家的日本，很快便顯露出對周邊地區領土的擴張野心。這一方面是由於當時西方列強都在忙於對該地區的吞食擴張，另一方面也是由於隨着中華帝國的不斷解體，東亞地區出現了一定的權力空白，不穩定的國際秩序進一步加劇了日本的野心。日本對外領土的擴張是得益於中華帝國的解體，與此同時，日本的擴張反過來又加速了這個解體過程。

中日甲午戰爭期間，日本曾討論過進攻台灣，但最終沒有實行。由於在黃海海戰及攻擊旅順口的戰役中，日軍取得了關鍵性的勝利，日本政府對清朝的胃口也就越來越大。經過多次交涉，締結了《馬關條約》，除保證日本對朝鮮支配外，清政府同意割讓台灣和遼東半島並支付巨額賠款。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曾擔心這樣會引起外國勢力的干涉，而結果的確是在俄、法、德三國干涉之下，不得不歸還了遼東半島。此後不久，俄國便將其權益範圍擴張至遼東半島及東北，對朝鮮半島形成包夾之勢。而且朝鮮國內的親俄派活動十分活躍，可以說日俄衝突已無法避免。

日俄戰爭（1904-1905年）對日本人的影響之巨，是中日甲午戰爭所無法比擬的。這是因為，作為一場亞洲國家同西歐近代化國家的戰爭，黃色人種破天荒取得了勝利；同時，它又助長了日本擴張的野心，日本從此開始不斷侵略中國國土。

日俄戰爭後，日本與俄國在中國東北的實力對比基本保持均衡（即相互承認彼此的權益）。為此，日俄之間曾簽訂了四次秘密協議，瓜分了東北的權益（美國也曾對經營南滿鐵路表現出濃厚興趣，但遭到日本政府的斷然拒絕）。然而時隔不久，這種勢力的均衡卻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首先是由於清朝的滅亡及中華民國的建立，強烈的反殖民主義、民族主義思想已成為中國人的共識。其次，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損耗了歐洲列強的實力，使其在一定程度上對亞洲地區「心有餘而力不足」。日本便趁此機會，向中國提出了「二十一條」，企圖進一步擴大在華利益。第三，則是因為爆發了俄國革命，俄國勢力不得不退出東北。日本曾為此與美、英、法聯合出兵西伯利亞，但因不守信用長期駐紮大量軍隊而招致其他列強的強烈不滿。

日俄戰爭對日本人的影響之巨，是中日甲午戰爭所無法比擬的。這是因為，作為一場亞洲國家同西歐近代化國家進行的戰爭，黃色人種破天荒取得了勝利；同時，它又助長了日本擴張的野心，日本從此開始不斷侵略中國國土。

日本將其勢力範圍滲透至因俄國退出而出現的權益空白地帶，當時的中國政府卻因北洋軍閥的混戰無力對此稍加抵抗。原本就受到日本支持的張作霖也在東北不斷擴大其勢力，漸漸地為其主子所不容，最終被關東軍暗殺。日本駐紮在東北的關東軍想方設法，使東北成為一個排他的、完全屬於日本的勢力範圍。

二 九一八事變與「滿洲國」

中日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後，日本無疑已成為東亞地區的軍事強國，為了擴大日本的勢力範圍，日本就在1931年策劃了九一八事變，並於翌年成立了傀儡政權——「滿洲國」，將整個東北完全置於日本的軍事統治之下。

那麼，日本最初為甚麼策劃九一八事變，進而成立「滿洲國」呢？

從1907年制訂的「帝國國防方針」來看，當時日本是以俄國為其陸軍的假想敵，而海軍的假想敵則是美國。之所以會有這樣的區別，完全是由於陸軍的參謀本部和海軍的軍令部各自為政、分別制訂戰略政策而造成的，而且，在以後的日子裏，兩個部門也未就此作出任何調整。這就意味着日本的軍事指揮部門並未認真地考慮過日本到底應該在怎樣一種情況下，為了甚麼目的，去決定與俄國（蘇聯）交戰還是與美國爭鋒。正是在這種缺乏統一戰略的情況下，日本加緊了對中國一步一步的侵略。

九一八事變主謀者之一的石原莞爾中佐（當時的關東軍參謀），在事變前曾著有《戰爭史大觀》、《作為國運昌隆基本國策的滿蒙問題解決案》等，他聲稱：「因為漢民族無法維持其自身的治安，所以，由日本佔領滿蒙並指導中國的政治，這不僅是有關日本存亡的大問題，對於中國人來講也是一種幸福。」石原參謀堅信必須軍事佔領東北，以備緊急避難之需。其實，如果東北真的落入日本手中的話，北有蘇聯，南與中國國境相接，一旦出現戰事，反而會陷入腹背受敵的戰略困境。正是由於上述原因，石原參謀後來對侵入中國並進一步擴大戰爭持反對立場，但他的意見在陸軍內部十分孤立，最終失去了影響力。

日本的陸軍有一個特點，它非但不服從文官政府（內閣和國會）的指揮，甚至無視參謀本部制訂的方針及關東軍參謀部的命令，往往由現場部隊擅自採取軍事行動，並進而擴大行動的規模。究其原因則有許多，其中之一就在於所謂「統帥權的獨立」（軍事指揮權不在政府而歸屬天皇，即軍隊獨立於政府）。1889年頒布的大日本帝國憲法，明確規定把軍事指揮權同政府機關割裂開來。不過，當初的政治家們還是發揮了一些統帥軍隊的功能。例如中日甲午戰爭時期，當時的首相伊藤博文就曾出席大本營（戰時所設陸軍參謀本部和海軍軍令部的協議機構）會議，撤換了無視參謀本部方針、一意主張進攻北京的第一軍司令官山縣有朋。按照規定，若要動用駐紮在國外的軍隊，必須先由參謀總長向天皇提出申請，在取得敕詔後方可發出命令，此外在獲取天皇批准之前，還必須由內閣認可所需的出兵費用。從這個角度而言，政府本來可以通過製作預算

日本為甚麼策劃九一八事變，進而成立「滿洲國」呢？從1907年的「帝國國防方針」來看，當時日本陸軍以俄國為其假想敵，而海軍的假想敵則是美國。日本的軍事指揮部門並未認真地考慮過在怎樣的情況下，為了甚麼目的，決定是與俄國還是與美國交戰。正是在缺乏統一戰略的情況下，日本加緊了對中國的侵略。

的方法控制軍隊，但是，軍隊方面又可以採用陸軍大臣遞交辭呈的方式迫使政府認可相關的既成事實。由於法律規定陸軍大臣必須是現役軍人，所以，只要陸軍不提出大臣人選，那麼內閣就只有提出總辭了。

另一方面，日本對中國侵略的升級和國際關係有關。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國際社會構築了一種後來被稱為華盛頓體系的國際協調體制。在華盛頓會議（1921-22年）上，簽署了確定美、英、日等主要國家主力艦擁有率的《海軍軍備縮減條約》，維護太平洋地區穩定的《四國條約》，以及保證中國獨立、領土完整、各國機會均等的《九國條約》等共七個條約、兩個補充協議。參加有關中國問題《九國條約》簽署的九個國家是：日本、美國、英國、法國、意大利、比利時、荷蘭、葡萄牙和中國。簡而言之，這個條約明確規定了不允許某一國獨佔中國這個大市場，中國應對各發達國家平等開放，各國享有相同的權利，保證利益均沾。隨著《四國條約》的生效，日英同盟自動廢止，這就意味着國際社會今後不再支持與容忍日本像中日甲午、日俄戰爭那樣的行為。然而，當時的日本並未充分認識到國際社會已發生了如此巨大的變化。

由於1929年爆發的世界性經濟危機，貿易保護主義和集團經濟盛行，發達國家的協調體制暫時處於不穩定狀態。九一八事變、七七事變就是在上述背景下發生的。

三 七七事變與太平洋戰爭

1937年7月7日爆發了盧溝橋事變，中日兩國的戰爭就此全面展開。然而，這次戰爭未如日本政府及軍部連戰速決的原始意願，陷入了泥沼般的持久戰、消耗戰。與此同時，由於日本對中國的進攻，日美關係逐漸惡化，並因此導致日本在1941年12月對美宣戰，太平洋戰爭爆發，最終以1945年8月日本宣布戰敗而結束。

那麼，當時駐華部隊的指揮官（參謀們）為甚麼不放過任何機會，極盡謀略地投身戰鬥以期擴大其佔領區呢？陸軍的一貫主張是備戰蘇聯。1941年，為了響應德國對蘇宣戰，日軍就曾在東北集結了70萬部隊及相應物資，稱之為「關特演」（關東軍特別大演習），戰爭一觸即發。正是出於上述目的，關東軍認為必須確保與中國國境相接地區的安全，以免腹背受敵，因此以擴大佔領區為上策。然而，這種行為引起了中國國民的極大憤慨，反日情緒空前高漲，中國軍隊也進行了頑強抵抗。其結果使得日軍為了所謂「安全保障」而不得不投入更大規模的軍事力量，進一步擴大侵略形成惡性循環。只是當時的日本軍方還沒有認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

日本陸軍中的官僚（尤其是參謀們）只關注那些事關眼前利益的戰術謀略，卻忽視了戰略思考，完全陷入主觀主義、自我中心主義的泥潭而不能自拔。由此便產生了對中國及中國人的傲慢自大情緒。

松井石根大將（進攻南京時的華中方面軍司令，在東京裁判中以指揮南京大屠殺的罪名被判處死刑）是陸軍裏有名的中國通，他曾形容道：「在一個家庭

裏，兄長在忍無可忍之下教訓了不斷惹事生非的弟弟，這種行為只不過是促使弟弟好好反省反省的手段。」也就是說，他認為日本是地位優於中國的「兄長」，而中國人民基於民族主義的抵抗運動則被視為「惹事生非」。

出於這樣的一種思路，日本侮辱中國，並為擴大侵略製造各種理由。

理由之一在於，他們認為中國自甘淪為歐美列強的殖民地。日本當時頂住了西歐國家的威脅，通過明治維新而最終使自己享有同歐美列強完全平等的國際地位。尤其是到了日俄戰爭之後，日本便自認為是已可以和歐美諸國平起平坐、獨立的近代化國家。這種想法構成了日本人自尊心的核心，他們認為，既然已經取得與歐美平等的地位了，那麼，日本和淪為歐美殖民地的中國之間的關係就不應是平等的，日本必須凌駕於中國之上。

理由之二在於，日本人不理解中國的文化傳統。中國人由於恪守其傳統與原則，沒能比較靈活地、策略地應對西方國家的進攻。日本人大多因此認為中國人缺乏適應能力，是不識時務的民族。其實，這是對中國文化的偏見，日本人似乎患上了健忘症，忘記了自己過去只是中國文明圈的一個附屬小國。而後來日本軍事上的勝利，又進一步強化了上述傾向。

理由之三在於，日本人普遍認為中國已經分裂了，不再有還手之力了。在日本，民眾視天皇為近代化的象徵，並在其領導下成功地完成了國民國家的建設。而清朝的皇帝則與之相反，無法成為中國民族主義的核心，中國必須尋找另一條出路，為此中國經歷了較長時期的分裂局面，直到1937年開始第二次國共合作，中國才形成了較為成熟的民族主義陣營。可惜當時的日本人大多未能充分認識到這一點。

侮辱中國的行為既反映了日本很難認同中國為平等國家的思想，與此同時，又可以說這體現了日本對中國的依賴。

1938年11月，日本近衛內閣頒布了名為「東亞新秩序」的宣言，聲稱立志把日本、「滿洲國」以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自給自足的大經濟圈。這個宣言出台後，美國鑒於日本七七事變後不斷擴大其佔領地，認為日本已脫離華盛頓體系，作為一名無視歐美諸國權益的侵略者繼續其戰爭行為。結果，日美關係進一步惡化，美國在加強對日經濟封鎖的同時，開始對中國提供實質性的軍事及經濟援助。

另一方面，日本在瞬息萬變的國際局勢下，很難確定國家的基本戰略：如果與蘇聯交戰，不斷擴大的中國戰線及日益惡化的日美關係都將成為其不堪承受的沉重負擔；如果向美國宣戰，就有可能失去石油等戰略物資的補給來源。如果想要避免戰爭，則必須撤出中國和東北，而這又是萬萬不可能的。結果，日本經過百般權衡，選擇了毫無勝算的對美開戰，以及為獲取石油而展開的南進行動。

為了使上述南進行動正當化，日本開始大肆鼓吹「大東亞共榮圈」思想，即要實現東亞乃至更大範圍的解放，建立自給自足的大經濟圈。所謂的「大東亞戰爭」就是保衛這一「大東亞共榮圈」的戰爭。當然，中國和美國是不可能承認日本這種欲稱霸整個東亞地區的戰略野心的。於是，由此而開始的太平洋戰爭以1945年日本的完全失敗而告終。

1938年11月，日本近衛內閣頒布了名為「東亞新秩序」的宣言，聲稱立志把日本、「滿洲國」以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自給自足的大經濟圈。這個宣言出台後，日美關係進一步惡化，美國在加強對日經濟封鎖的同時，開始對中國提供實質性的軍事及經濟援助。

1941年，為了響應德國對蘇宣戰，日軍就曾在東北集結了70萬部隊及相應物資，稱之為「關特演」，戰爭一觸即發。關東軍認為必須確保與中國國境相接地區的安全，以免腹背受敵，因此以擴大佔領區為上策。然而，這種行為引起了中國國民的極大憤慨，反日情緒空前高漲。

四 戰後冷戰體制與中日關係

日本的對美戰爭是一場毫無戰略規劃的戰爭，作戰目的既不明確，也缺乏戰後媾和的任何設想。同發動七七事變時一樣，日本仍幻想着憑藉戰爭初期的勝利，迫使對方喪失鬥志而主動求和。但事實卻是，美國決心堅持戰鬥直至日本無條件投降。

這次戰爭的結局本就在美國政府的意料之中，倒是中國國內局勢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國共內戰在日本戰敗後不久即全面展開，而且最終的結果是，蔣介石國民黨政府被趕到台灣孤島，中國大陸成立了共產主義政權。這對於美國也就意味著，它所希望的將中國劃入自由主義國家範疇的努力失敗了。隨着日益嚴峻的美蘇對立，戰後國際社會逐步分裂為冷戰狀態的兩大陣營。

日本在宣布失敗後，依照《波茨坦宣言》放棄了台灣、朝鮮半島、滿洲等殖民地，隨後在以美國為首的盟軍佔領當局的領導下，起草了新的憲法，其中載入了「放棄戰爭」的條款。1951年，承認日本恢復獨立的《舊金山條約》得以簽署，當時還簽訂了《日美安全保障條約》，不允許日本再擁有軍備。上述條約還同時提出，美國會保障日本的國家安全。在嚴酷的美蘇冷戰體系之下，日本作為東亞地區橋頭堡的重要作用不斷增加，從而才能依賴美國的核保護傘，復興戰後經濟。

不允許日本擁有獨自的軍事力量也就意味着它不可能擁有獨自的對外政策和世界戰略，即使恢復獨立以後，也必須繼續置於美國的管理之下。自衛隊就其裝備來看是一支非常出色的軍隊，但憲法規定了它不是軍隊，和警察一樣，它受到一般國內法規的約束，不能在國外進行活動。在冷戰體系之下，日本事實上是不存在脫離美國採取獨自行動的可能性，比如，同蘇聯、中國的接近，締結和平條約，等等。因此，在戰後約二十五年間，日本也就不會有甚麼對華政策了。

1971年美國國務卿基辛格訪問中國，同年10月中國又恢復了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翌年，尼克松總統也實現了中國之行，中美恢復邦交。美國與中國的關係改善，不僅牽制了它的主要敵手蘇聯，而且有利於整個東亞地區的穩定。而中國通過改善同美國的關係，也為其自身的安全保障及未來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雙方這種不謀而合的歷史性和解，為中國始於1979年的改革開放創造了良好的客觀外部條件。

中美之間的「越頂外交」（對日本而言），的確使當時的日本政府十分困惑，但同時也促使日方產生恢復中日邦交的強烈願望。中日邦交正常化當然包括處理兩國戰爭的遺留問題。關於日本的政治責任（對九一八事變至七七事變等一系列侵略行為所應負的責任），東京裁判已做出了裁決（中華民國政府參加了東京裁判，而中華人民共和國當時還未成立）；關於國家賠償問題，蔣介石曾宣布放棄要求權，因而沒有進行，北京政府對此向來也沒表示明確異議。

同西方改善關係是中國共產黨改變其性質的重大抉擇，也可以說它影響了中國以後的發展道路。事實上，中國在此基礎上才能較早（比柏林牆的崩潰早了10年）地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並取得了顯著的成果。中國藉此才能在冷戰結束後的國際社會中立於不倒的地位。

我認為，同以往相比，二十一世紀前半期的中日關係會有以下幾個不同點：

第一，東亞地區不再像二十世紀前半期那樣，只是一個與世界其他部分相

對隔絕的地域，而是與整個世界緊密地一體化了。僅靠該地域的當事國已無法決定東亞地區的命運。

第二，日本與中國憑藉其互補性成為該地區的基軸。一種既不同於傳統上以中國為核心的夷夏秩序，又不同於近代以日本為核心的大東亞秩序，更不同於冷戰時期的隔斷局面，開始出現中日兩國的平等關係。只是這種關係又各有側重：中國是一個政治、軍事大國，日本則以經濟大國的面目出現，互補互利。並且，美國的東亞政策會盡量調停中日兩國間的矛盾。

第三，包括日本、中國及周邊各國在內的整個地區的經濟實力將十分巨大，其市場佔有率可以和現在的美國相匹敵。東亞地區不僅受到國際形勢的影響，反過來也是決定國際局勢的一個主要因素。也就是說，中國的行為方式將給予國際社會前所未有的巨大影響。

日本的任務在於，認清上述必將產生的變化，採取理智恰當的行為，以維持與美國、中國的良好關係。曾有這麼一種觀點認為，日本的惡夢或是美中兩國發生紛爭，或是美國和中國關係密切。其實，前者的確會帶來一場惡夢，而後者則是我們所盼望的。日本的安全及國家利益，乃至於世界利益，都有賴於中美兩國穩定、友好的關係。對中日關係的回顧，也有助於日本更深刻地理解面向未來所應該承擔的上述任務。

盛勤 譯

日本在以美國為首的盟軍佔領當局的領導下，起草了新的憲法，其中載入了「放棄戰爭」的條款。在冷戰體系之下，日本事實上是不存在脫離美國採取獨自行動的可能性。因此，在戰後約二十五年間，日本也就不會有甚麼對華政策了。

參考文獻

- 袁郁彥：《昭和天皇的五個決斷》（講談社，1984；文春文庫，1994）。
 袁郁彥：《南京事件——「虐殺」的構成》（中央公論社，1986）。
 緒淵真樹：《昭和十六年夏季的敗戰——總力戰研究所「模擬內閣」關於日美戰爭必敗的預測》（世界文化社，1983；文春文庫，1986）。
 入江昭：《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Asia and the Pacific》（London, New York: Longman, 1987）。藤原初枝譯：《太平洋戰爭的起源》（東京大學出版會）。
 加藤典洋：《敗戰後論》（講談社，1997）。
 小林吉則：《新傲慢主義宣言戰爭論》（小學館，1998）。
 小林吉則、竹田青嗣、橋爪大三郎：《正義、戰爭、國家論》（徑書房，1997）。
 小堀桂一郎：《靖國神社與日本人》（PHP新書，1997）。
 兒島真：《天皇（I-V）》（文春文庫，1980-81）。
 小室直樹、色摩力夫：《為了國民的戰爭與和平之法》（總合法令，1993）。
 森村誠一：《新版「惡魔的飽食」——日本細菌部隊恐怖實錄》（角川文庫，1983）。
 大江志乃夫：《日本參謀本部》（中央公論社，1985）。
 大江志乃夫：《東亞史上的中日甲午戰爭》（立風書房，1998）。
 岡田英弘：《台灣的命運》（自立社，1985）。
 田中正明：《帕爾博士的日本無罪論》（學文社，1963，1989年增補改訂）。
 副島隆彦：《廢國日本論》（PHP研究所，1997）。

橋爪大三郎 1948年生，東京大學社會學研究科博士，現為東京工業大學教授。主要著作有：《橋爪大三郎選集》（I-III）、《語言遊戲和社會理論》、《佛教的言說戰略》等。

有這麼一種觀點認為，日本的惡夢或是美中兩國發生紛爭，或是美國和中國關係密切。其實，前者的確會帶來一場惡夢，而後者則是我們所盼望的。日本的任務在於，採取理智恰當的行為，以維持與美國、中國的良好關係。

世紀をまたぐ日中関係

——近代日本の対中政略を回顧する

（跨世紀的中日関係：回顧近代日本対中国政略）

橋爪大三郎（日本・東京工業大学）

日本と中国の両国は、地理的に近接しているばかりでなく、歴史的にも深いつながりをもっている。

来世紀の日中両国は、ヨーロッパで国境を接するかつてのフランスとドイツのように、宿敵としていがみ合う方向へ向かうのだろうか。それとも、大西洋を挟んだイギリスとアメリカのように、いったんは交戦しても、永続する平和的關係を築きあげることができるのか。もちろん後者が望ましいわけだが、そのためには日中両国が、あいまいなままに残されている歴史の問題に直面し、それを乗り越え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だろう。

そのためにも、まず20世紀以前の日中両国関係を回顧し、それを通じて21世紀の日中関係をうらなってみることにしよう。

解体する中華帝国と、新興日本

20世紀のはじめ、中国は、解体の瀬戸際でのたうちまわる老大国だった。それは、明治維新を成功させ、旧体制を脱却して興隆しつつあった日本と好対照である。

その両国が、朝鮮半島で衝突したのが、日清戦争（1884～1885）である。

この戦争は、朝鮮（韓国）をめぐる両国の権益や利害対立にもとづく衝突であったが、同時に、中日両国の異なる世界観の衝突でもあった。

清朝は、伝統的な中華帝国の世界観から抜け出せないでいた。中華帝国の世界観によれば、中国は世界の中心であり、周辺の国々は属邦である。中国に朝貢し、その見返りに国王に奉じられているという関係（夏夷秩序）が基本である。実力において中国を上回る欧米列強が出現しても、いやだからこそかえって、中国はこの世界観にこだわった。

いっぽう日本は、もともと中国が世界の中心であるという秩序を面白くないと思っていた。そこで、西欧文明と接触したのを機会に、日本を近代国家に衣替えすることにした。明治維新の目的は、強力な政治的リーダーシップをうみ出し、日本を欧米諸国と対等の国

民国家として再編成することである。日本が西欧的な意味で独立国となれば、日本は中国と対等の位置にのしあがることになる。

だから両国が、朝鮮半島の支配権をめぐる衝突したのは、歴史の必然であったと言える。

日本は、もともとうわべだけのものだった儒教を、明治維新を機会にかなぐり捨て、西欧流の国際政治の原則から東アジアを見直した。中国が世界の中心であるとする儒教は、西欧列強の圧倒的な軍事力のまえば非現実的であり、そんなものにこだわっていると植民地化されてしまう。ところが韓国は、日本と違って儒教の原則に忠実すぎて、近代化の必要をまったく理解せず、列強のどれか（ロシア）の植民地になってしまうおそれが高いように思われた。朝鮮半島が、外国の植民地になってしまえば、日本の独立と安全が脅かされる。それを防ぐには、先手を打って、日本の影響力を強めてしまうほうがいい。日本のこうした自分勝手な思惑は、ロシアの進出を警戒するアメリカやイギリスによって後押しされた。

清朝は、韓国を属邦、自分をその宗主国とみなしてきたので、韓国に混乱が起これば軍隊を派遣するのは当然と考えるし、日本が韓国に権益を拡大すれば排除しようとする。これに対して日本は、日本と中国は対等な独立国だと主張した。

韓国について日本は、自分の都合で原則を使い分けた。すなわち、いっぽうで韓国は独立国である（中国の宗主権は認められない）とし、もういっぽうで要保護国（日本と対等な中国の下位にあるのだから、日本の下位にある）とした。実際、日清戦争の開戦の詔勅で「韓国の独立」を戦争目的に掲げておきながら、戦勝後の日本は韓国を属国化し、ついには独立を奪ってしまう（日韓併合、1910年）。

*

近代国民国家に脱皮した日本は、すぐさま、周辺地域への領土的拡張に関心を示した。ひとつには、当時の列強がそろって同じことをしていたから、もうひとつには、東アジアでは中華帝国が解体しつつあり、権力の空白と不安定な国際秩序が生まれていたからである。日本の領土拡大は、中華帝国の解体の結果であったが、同時に日本がそれを促進する役割も果たした。

もっとも日本は、中国そのものを侵略の対象として、日清戦争や日露戦争の時期に意識していたわけではない。（それどころか、日本は1940年ごろになっても、あるべき日中関係についての確固とした政策を持てなかった。）

明治維新後、日本は「富国強兵」の旗のもと、近代的な軍隊の建設を急いだが、その仮想敵国はロシアであった。日本陸軍の重鎮・山県有朋（当時の参謀本部長）は、『進隣邦兵備略表』（1880）を天皇に上表し、「清国誠に近日の状の如く兵制を改革し、駭々として止まざれば、遂に万国に横行して可なり、夫隣邦兵備の強き一は以て喜ぶべく、一は以て懼るべし」とのべている。要するに、中国の台頭はロシアを牽制するという意味で歓迎すべきものであるが、同時に、それ自身として警戒すべきだという、どっちつかずの見解を示している。

近代国家として主権を確立するためには、国境を画定し、主権の及ぶ範囲をはっきりさせなければならない。隣国との交渉が必要にする。中華帝国は、この点があいまいだったから、日本は中国側の意図を試すような行動に出ている。それは、1874年の「台湾征伐」である。

1871年に琉球（沖縄）の人びとが台湾南部に漂着し、台湾の原住民・高砂族に首を狩られて殺害されてしまった（牡丹社事件）。明治政府が清朝に抗議したところ、台湾の原住民は「生蕃と謂うて之を化外に置き、甚だ理することをせざるなり」、すなわち、責任が取れないという返事だったので、1874年に陸軍中将西郷従道を「台湾蕃地事務都督」とする討伐隊が台湾に上陸、実力で報復した。英国公使の調停により、清国が、日本に賠償金を支払うことで決着した。

この事件のポイントは、日本が琉球の人びとの被害を報復する権限を有するかどうか、すなわち、琉球は日本国の主権下にあるかどうかである。もともと琉球国は、日本の薩摩藩に服属しつつ、清朝とも冊封関係を保っていたので（両属関係）、明治政府は廃藩置県（1871）を実施することができず、代わりに琉球藩を置いた（1872）。琉球の王家ならびに清朝は不服であったが、明治政府はさらに圧力を強め、1879年には琉球県の設置（琉球処分）を強行する。1874年の台湾出兵は、その伏線であった。その後、明治政府は、琉球諸島のうち宮古・八重山を清国に割譲する代わりに、日本の権益を承認させる条約を清国と結ぶが、批准がすまないうちに日清戦争が起これ、日本は逆に清国から台湾を獲得することになった。

日清戦争の際、日本は台湾への侵攻を検討したが、実行されなかった。黄海海戦や旅順口の攻撃などで順調に勝利を収めたので、日本は清国に対する講和交渉に高姿勢で臨み、朝鮮の独立保障のほかに、台湾と遼東半島の割譲、巨額の賠償金の支払いを約束する条約を結んだ（下関条約）。首相の伊藤博文は、外国の干渉を恐れていたが、国内を抑えるこ

とができず、結果的にロシア・フランス・ドイツの三国干渉をまねいて、遼東半島を返還せざるをえなくなった。完全な政略的・外交的失敗である。ロシアはこののち、遼東半島や満洲の権益を清国から譲り受け、朝鮮半島を包囲する形勢になった。また韓国でも、ロシアに接近する動きが顕著になったので、日本とロシアの衝突は不可避となる。

日本が十分に理解しなかったのは、欧米列強が、中国はすべての国々のために開かれているべきで、一国が抜けがけて権益を独り占めにしてはならないと合意していることだった。日本は、下関講和条約に、イギリスに有利な長江上流域の開放を盛り込むなど、イギリスの支持を取りつけるための配慮をしてはいたが、日本の領土拡張が列強の警戒を招くことを過少評価したのである。

日露戦争以後の日中関係

日露戦争（1904～1905）は、日清戦争と比較にならない影響を、国際社会に与えた。それは、アジア人の国家が西欧近代国家と戦争して勝利した、歴史上最初のケースだったからである。それは、西欧による植民地支配の時代がやがて終わるという希望と確信を、多くの人びとに与えるものであった。歴史の皮肉は、そのように勇気づけられた中国の国土を、日本がこれから侵略しようとしていたことであった。

日本は、日清戦争の賠償金を、海軍を中心とする軍備の拡張に使い、15個師団を朝鮮半島に集中した。日本海海戦や奉天会戦で勝利したものの、ロシアと同様、日本も戦争を継続する能力を失い、アメリカの仲介によりポーツマス講和条約を結ぶ。この条約により日本は、南樺太ならびにロシアの遼東半島租借地を獲得し、南満洲鉄道の権益を譲り受けた。この遼東半島租借地と南満洲鉄道を警備するために駐屯したのが、関東軍である。

日露戦争を日本は、イギリス、アメリカの支援のもとに戦った。戦費をまかなう国債はロンドン市場で販売され、日英同盟（1902）は日露戦争の準備のためのものだった。シベリア鉄道を開通させ東アジアに軍事的プレゼンスを強めようとしているロシアに、日本が対抗することはイギリス、アメリカの国益に適うものだった。このような有利な国際環境が日本の勝利を保証したことを、当時の日本人はよく理解しておくべきだったろう。

*

日露戦争の結果、満洲において、日本とロシアの力の均衡（権益の相互承認）がうまれた。四次にわたる日本とロシアの秘密協定が結ばれ、両者の権益の調整がはかられた。

満洲は、征服王朝である清朝を樹立した満洲族の故地であり、華北以南の中国とは切り

離された領域を形成していた。日本とロシアは、この地の権益を独占的に分け合うかたちになった。(アメリカは、南満洲鉄道の経営に興味を示したが、日本はこれを断ってしまった。)ところがまもなく、この力の均衡は、根底からくつがえってしまう。

まず、清朝が倒れ、中華民国が成立した。強固な反植民地主義、中国ナショナリズムが人びとのあいだに浸透し始める。第二に、第一次世界大戦によって、欧州は消耗し、列強はアジアに向ける余力を失った。日本のその隙に、中国に対して21ヶ条の要求をし、単独で権益の拡大をはかった。第三に、ロシア革命が起こり、満洲からロシアの勢力は駆逐された。日本はアメリカ・イギリス・フランスとともにシベリアに出兵したが、申し合わせを破って大量の兵を長期にわたってシベリアに居すわらせ、列強の不信をかかった。

満洲からロシアが抜けた権力の空白を、日本が埋めることになった。中国は、軍閥が乱立する混乱状態で、それに対抗することができなかった。満洲では、日本の後押しする張作霖が勢力を伸ばしたが、だんだん邪魔になってきたために、関東軍によって爆殺されてしまう。満洲に駐屯する関東軍は、さまざまな謀略をめぐらし、満洲を日本の排他的な勢力圏にしようとはかった。

満洲事変と、満洲国

日清戦争と日露戦争は、日本の植民地獲得・拡大によって終わったが、もともとは防衛的な動機によるものだった。しかし、日清戦争で北洋艦隊を撃破し、日露戦争でロシア東洋艦隊、バルチック艦隊を全滅させた日本は、東アジアの突出した軍事強国にのしあがった。そして、1931年には満洲事変を起こし、翌年には傀儡国家・満洲国を成立させて、満洲全域を日本の軍事制圧下に置いた。

日露戦争のあと、満洲事変、日華事変を経て1945年の終戦に至る日本の行動には、いくつかの特徴がみとめられる。互いに関連していることだが、第一に、政府や軍部に統一した政略・戦略が必ずしも存在しなかった。第二に、しばしば政府や参謀本部の命令が無視され、現場が暴走した。第三に、既成事実を追従する意思決定が行なわれ、責任主体がいまいであった。第四に、変化する国際情勢がよく認識されず、国際社会の反応について無理解である場合が多かった。

そもそもなぜ、日本は満洲事変を起こし、満洲国を作ったのか。

1907年に制定された「帝国国防方針」では、陸軍の仮想敵国はロシア、海軍の仮想敵国はアメリカとされている。陸軍の参謀本部、海軍の軍令部は別々に戦略を定めたからであ

る。そして以後、両者の調整がはかられることはなかった。それは、日本がどういう場合に何を目的として、ロシア(ソ連)と戦いアメリカと戦うことになるのか、日本の指導部が真剣に考えなかったことを意味する。こうした統合戦略の欠如が、逆説的なことに、中国に対するなしくずしの侵略を生み出した。

満洲事変の首謀者の一人、関東軍参謀石原莞爾中佐(当時)は事変前に『戦争史大観』『国運展開の根本国策たる満蒙問題解決案』などを著し、「漢民族は自分で治安維持ができないから、日本が満蒙を領有し、中国本体を政治的に指導することは、日本の存立上必要であるし、中国人にとっても幸福である」などとのべていた(大江[1985:162])。石原参謀は、満洲が中国の一部であるとは必ずしも認識しておらず、緊急避難的に満洲を軍事占領することが必要だと信じていたのである。いざ満洲が日本の手に落ちてみると、北にソ連、南に中国と国境を接し、腹背に二正面を有するという、戦略的に困難な状態が生まれた。もしもソ連との戦争を準備し、満洲がその戦略拠点だと考えるのなら、中国との友好的な関係(同盟関係か、せめて局外中立の関係)を保っておかなくてはならない。このため石原参謀は、中国への侵入と戦線拡大に反対する立場をとるが、陸軍の内部で孤立し、影響力を失っていく。

*

日本の陸軍は、文民(内閣と国会)の統制に服さなかったばかりか、参謀本部の方針、関東軍参謀部の命令さえ無視して、現場の部隊が独自に戦闘行動を開始し、拡大してしまうという特徴があった。

その原因はいろいろだが、ひとつが、「統帥権の独立」(軍事指揮権が、政府ではなく天皇に属すること、すなわち、軍の政府からの独立)にあることは明らかだ。1889年に公布された大日本帝国憲法は、議会を開設し日本を立憲君主制国家とすることを定めたもののだが、同時に議会を通じて国民の権利が拡大することを懸念し、軍事指揮権を政府から切り離した。それでも当初、政治家の軍に対する統制は機能していた。たとえば、日清戦争当時、伊藤博文首相は大本営(戦時における陸軍参謀本部と海軍軍令部の協議機関)に出席し、参謀本部の方針を無視して北京攻略を主張した山県有朋第一軍司令官を更迭している。ところがやがて軍部は、国家のなかの国家となり、絶大な権限をふるい始める。そして、軍紀違反・命令違反が常態化していく。

張作霖の爆殺事件(1928)は、関東軍の参謀・河本大作大佐の独断による謀略であったが、上層部はこの明らかな軍紀違反を、厳しく処分しなかった。満洲事変(1931)の中心

人物、板垣征四郎大佐も石原莞爾中佐も、処罰されるかわりに称賛された。また満洲事変の際には、朝鮮駐屯軍も独断で、関東軍に呼応して満洲に部隊を侵入させている。1938年には、張鼓峰事件（参謀本部作戦課が独断で朝鮮駐屯軍の部隊を動かし、ソ連の武力偵察を試みて全滅しそうになった事件）が起こったが、稲田作戦課長らは処罰されなかった。同じ過ちが翌年のノモンハン事件でも、大規模に繰り返された。

国外に軍を動かす場合には、参謀総長が天皇に裁可を求め、奉勅命令を発するという手続きがとられる。しかし裁可の前に、内閣が出兵費用を承認する必要があった。予算の面から、本来なら、政府が軍を統制できるはずだった。しかし軍は、陸軍大臣の辞職を切り札に、既成事実を政府に認めさせることができた。陸軍大臣は現役と決まっていたので、陸軍が大臣を出さないければ、内閣は総辞職するしかなかったのである。

*

1946年に開かれ、翌年結審した東京国際軍事裁判（連合国による日本人戦犯の裁判、東京裁判ともいう）は、1931年の満洲事変から1945年にいたる日本の行動を、国際法に違反する侵略行為であり、有罪であるとした。アメリカをはじめとする連合国は、満洲事変を境に、日本が明確に中国侵略に踏み切ったと理解しているのである。

第一次世界大戦ののち、国際社会は、のちにワシントン体制と呼ばれる国際協調体制を構築した。ワシントン会議(1921-1922)は、日米英など主要国の主力艦保有比率を定めた海軍軍縮条約や、太平洋地域の安定を定めた四ヶ国条約、中国の独立、領土保全、各国の機会均等などを約した九ヶ国条約など、七つの条約と二つの補足協定を締結した。中国に関する九ヶ国条約に調印したのは、日本、アメリカ、イギリス、フランス、イタリア、ベルギー、オランダ、ポルトガル、中国の九ヶ国。簡単に言えば、中国は、大きな市場なので一国の抜け駆けを許さず、先進各国に等しく開放するものとし、各国が仲良く利権を分け合おうというものであった。

四ヶ国条約の発効にともない、日英同盟は廃止された。これは、日清・日露のような日本の戦争行為を、今後国際社会は支持もしないし、容認もしないという明確なサインだった。しかし日本は、国際社会の大勢が変化したことを十分に理解できなかった。

これに対して中国は、自国の独立と安全が国際社会の支援にかかっていることを、十分に理解していた。中国が日本の侵攻を耐え忍ぶことができたのは、ナショナリズムの気運が高まり抗日の旗印のもとに国民が結束したのもさることながら、アメリカ、イギリス、ソ連といった国々の支援をしっかりと取りつけ、国際社会のなかでますます日本が孤立して

ゆくという状況を的確に認識し、適切に行動したからである。

たしかに1929年の世界恐慌をきっかけに、保護貿易主義とブロック経済が広まり、先進国の協調体制が一時不安定となった。満洲事変、日華事変はそうした背景のもとで起こったが、最終的には、国際社会はアメリカ・イギリスを軸とするワシントン体制を再建する方向でまとまり、日本はその国際的な連携によって打倒されるのである。

日華事変と、大東亜戦争

1937年7月7日、蘆溝橋事件が勃発し、みるみるうちに日中の全面的な衝突に発展した（日華事変）。この戦争は、日本および日本軍の意図に反して、泥沼の長期戦、消耗戦となっていく。そして、日本の中国侵攻によって日米関係は険悪となり、このために1941年12月の対米戦争が起こった。この大東亜戦争は1945年8月、日本の敗戦に終わり、ようやくすべてが決着する。

日華事変当時、近衛文麿内閣（第一次）も軍も「事変不拡大」の方針をとろうとした。にもかかわらず戦争は、「ずるずると」拡大して行った。日本の指導部の望まない戦争がいったいなぜ、日中の全面衝突に拡大して行ったのか。ここから、日中関係の深層を掘り下げていくことができる。

蘆溝橋での日中両軍衝突は、政府にも陸軍にも予想外の出来事だった。参謀本部の石原莞爾第一部長らは不拡大のため奔走したが部内をまとめきれなかったうえ、三個師団の動員案を決裁してしまう。近衛内閣は「今後とも局面不拡大の為平和的折衝の望を捨てず」とただし書きをつけたものの、政府の弱腰を非難する世論に押されて、強硬な声明を発表する。支那派遣軍の参謀部も慎重派で、ようやく出先の中国軍と停戦協定にこぎつけた。しかし南京の蒋介石政権は日本の姿勢に疑問を抱き、停戦を認めずに華北への派兵を命じてしまう。これに対して、陸軍は華北への、海軍は華中への侵攻を主張した。結局その両方の作戦に加えて、首都南京までも攻略することが決まり、戦線は無際限に中国全土に拡大していく。

戦火が拡大したのは、現象としてみるならば、現地の部隊（支那派遣軍、関東軍）が上部の方針を無視して衝突の既成事実を積み重ね、それを追認させて行ったからである。こうしたことが可能だったのは、「統帥権の独立」という、大日本帝国の組織原則の欠陥によるところが大きい。日華事変の以前にも、日本は、満洲事変の停戦協定である塘沽停戦協定（1933）に加え、武力を背景に、河北省からの国民党撤退を定めた梅津・何応欽協定

(1935)、チャハル省からの国民党撤退を定めた土肥原・秦徳純協定(1935)を結び、華北を中国から分離させることをはかっていた。

*

それではなぜ、現地部隊の指揮官(参謀たち)は、あらゆる機会を逃さず、謀略をめぐらしてまで、戦闘を仕かけ占領地を拡大しようと考えたのか。

陸軍は一貫して、対ソ戦を準備していた。1941年には独ソ戦開始に応じて、関特演(関東軍特別大演習)と称して70万の部隊・資材を満洲に集結、戦争の一手手前まで進んだ。関東軍はそのため、背後にあたる中国国境側の安全確保を重視し、占領地を拡大しておくべきだと考えた。こうした行動は、中国を刺戟し、中国正規軍・ゲリラの抵抗と中国国民の反日意識を強める結果、「安全確保」のためにますます大規模な作戦が必要になる。まさしく悪循環である。しかし、そのことの重大性に対する日本軍の認識は、はなはだ甘かった。

陸軍の官僚(特に参謀)たちは、彼らの任務である戦略的思考のかわりに、目先の戦術にとらわれていた。彼らにとっては、戦術的勝利を収めることが至上命令であり、それがどのような戦略的・政略的意味をもつのか、国益につながるかはどうでもよかった。陸軍組織の自己目的化であり、自己中心主義(主観主義)であり、おそろべき頹廃である。

ここから、中国ならびに中国人に対する、傲慢と甘えとが生まれてくる。傲慢と甘えは一見両極端な感情だが、根は同じ(自己中心主義)である。

松井石根大将(南京を攻略した中支那方面軍司令官であり、東京裁判で南京事件の責任を問われ死刑)は、陸軍きっての中国通として知られ、生涯を日中関係改善に尽くした人物である。その彼が、中国に対する日本の軍事行動を、「一家内の兄が忍びに忍び抜いても猶且つ乱暴を止めざる弟を打擲するに均しく……可愛さ余っての反省を促す手段」だったと形容する。日本を中国より優位な「兄」、ナショナリズムにもとづく抵抗運動を「乱暴」と考えてしまっている。明治以降の多くの軍人や政治家にとって、中国は、無意識な侮蔑の対象であった。

彼らがなぜ中国を侮蔑するのか、その構造を考えてみよう。

第一の理由は、中国が欧米列強の植民地に甘んじていること。日本は、西欧文明の脅威に抗して明治維新をなしとげ、独立した近代国家へと脱皮をはかった。明治日本の国家目標は、富国強兵に加えて「万邦対峙」、すなわち欧米列強と対等な地位を確保することである。そして、特に日露戦争のあとでは、欧米と対等であると自認するようになった。こ

れが、日本人の自尊心の核を構成した。日本と欧米が対等であり、欧米の植民地が中国であるならば、日本は中国と対等でなく、優位で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中国は欧米の植民地であるから、日本は中国より優位である。日本は中国より優位であるから、日本は中国を植民地にしてもよい。——単なる同語反復だが、日本人はこの思考回路のなかに閉じ込められた。そして、この優劣の順序づけが、あくまでも欧米を中心とする価値観にもとづく(日本人の対欧米劣等感の裏返しである)ことに注意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第二の理由は、中国の知的伝統に無理解であったこと。中国の人びとは、中国の伝統と原則に忠実であったために、西欧諸国の侵攻に柔軟に対応できなかった。日本人は、そのような中国人を、適応力に欠け実際的な思考のできない人びとと見なす傾向があった。それは、日本が中国文明の周辺にすぎなかったという過去を忘れる健忘症、ならびに、単なる異文化に対する偏見にすぎなかったが、軍事的勝利によってその傾向は強化された。

第三の理由は、中国が分裂し、無力だと思われていたこと。日本は、天皇を近代化の象徴として担ぎだし、そのもとで国民国家を形成することに成功した。いっぽう清朝の皇帝は、中国民族のナショナリズムの核となることができず、別なところにその中心を築きあげなければならなかった。そのために分裂状態が長びいたのだが、1937年に第二次国共合作が成立する前後からの中国には、強固なナショナリズムが形成されていた。そのことを当時、十分に認識した日本人は少なかった。

中国に対する侮蔑は、日本が中国を対等な国家として認めることが困難であったことをあらわしているが、それは同時に、中国に対する甘え(依存)であるとも考えられる。

日華事変は、短期の局地的な戦闘として収拾可能なものだった。しかし、日本の軍と政府の当事者はその明確な意思を持たず、既成事実を追認し続けるだけだった。そして、もうひと押し軍事的な圧力を加えれば中国側が妥協して、日本の要求を受け入れるであろうという非現実的な希望をいだき続けた。上部の明確な政略・戦略を信じていない前線の指揮官や参謀たちは、目の前に戦術的な勝利を収める機会があると思えば、作戦行動に移ることをためらわなかった。結果として日華事変は、日本の意図を裏切って、しかし必然的に、長期の消耗戦に移行していく。

日本は中国が、日本に軍事的に屈伏したあとでも、日本の「真意」を理解し受け入れ、協力的になるであろうと夢想した。これは日本が、現実外交の出発点である、相手国の利害と世界観にもとづいて事態を認識し、情勢を多角的に把握するという最低限の手続きを

踏まなかったことを意味する。日本の主観的願望によれば、中国は日本と同じアジアの一員として、欧米勢力の駆逐に協力すべきであり、中国の権益を日本が独占することを認めるべきである。いっぽう中国にしてみれば、それこそが侵略にほかならないのであり、それを排除するためには欧米諸国の国際的な支援が不可欠であった。

蒋介石政権は、このことをよく理解していた。そして、何回かの危機的状況——ドイツの日本への接近、第二次世界大戦の勃発に伴う国際情勢の変化、日ソ中立条約（ソ連の事実上の満洲国承認）——をしのいで、アメリカに対日戦争を決意させることに成功する。

*

1938年11月、近衛内閣は「東亜新秩序」を宣言する。これは、日本・満洲・中国が、自給自足の経済圏をめざすというものであった。これは決定的であった。アメリカは、日本が、日華事変による占領地の拡大という既成事実にもとづいて、ワシントン体制から逸脱し、欧米諸国の権益を無視した侵略者として行動していくという宣言だと受け取った。この結果、日米関係は日増しに陰悪なものとなってゆく。アメリカは、日本の経済封鎖を強めると同時に、中国への本格的な軍事・経済援助に着手する。

いっぽう日本は、流動的な国際情勢のなかで、国家の基本戦略を決めかねていた。もしもソ連と戦うことになれば、拡大した中国戦線や悪化しつつある日米関係は重荷となる。もしもアメリカと戦うことになれば、石油など戦略物資の補給がおぼつかない。戦争を回避するには、中国と満洲から撤退する必要がある、それはほとんど不可能である。結局日本の選択は、勝算のない対米開戦、そして石油獲得のための南進であった。

この南進を正当化するため、「大東亜共栄圏」、すなわち、東アジアよりも広い範囲での植民地解放と自給自足圏の樹立がうたわれる。大東亜戦争は、この「大東亜共栄圏」を防衛するための戦争だった。けれども、東アジア全域におよぶ日本の覇権を、中国もアメリカも容認するわけにはいかなかった。こうして始まった日米戦争は、1945年に日本の完膚なきまでの敗戦によって終わる。

戦後冷戦体制と、日中関係

日本の対米戦争は、戦争目的が明確でなく、どのように講和に持ち込むかの展望も欠いた無謀なものだった。日華事変のときと同じく、日本は、緒戦の勝利で相手が戦意を失えば講和に持ち込めるだろうとの甘い期待を持っていた。しかし実際には、日本を無条件降伏させるまで戦い抜くというアメリカの戦意は固く、そうした余地などはじめからなかつ

たのである。

アメリカにとっても、戦争の結果は意外なものだった。日本の敗戦に続く国共内戦の結果、蒋介石の国民党は台湾に追われ、中国大陆に共産主義政権が成立した。中国を自由主義圏にとどめるという戦争目的は、達成されなかった。厳しい米ソの対立が始まり、世界は冷戦の構図のもとで凍結される。

*

敗戦の結果、日本はポツダム宣言に従って、台湾、朝鮮半島、満洲などの植民地を手放した。そして、アメリカをはじめとする連合軍の占領下で、新しい憲法が起草され、そこには戦争の放棄が盛り込まれた。1951年、日本の独立を認めるサンフランシスコ講和条約の調印と同時に、日米安全保障条約が調印された。日本の再軍備を認めない代わりに、日本の安全を保障する。厳しい米ソの冷戦下、日本は東アジアにおける橋頭堡として重要性を増し、アメリカの核の傘に守られて経済を復興させ、資源と市場へのアクセスを許されて、繁栄への道を歩むことになる。

いっぽう中国は、封じ込め政策のもとで、独力での経済建設を強いられた。ことに、中ソ論争（中ソ関係の悪化）と国内の路線対立（文化大革命）は、中国経済をいちじるしく停滞させた。こうした状況を背景に、米中の電撃的な関係改善がはかられる。

日本が独自の軍事力を持つことを許されないということは、独自の外国政策、独自の世界戦略を持つことを許されず、独立後もひき続きアメリカの管理のもとに置かれていることを意味した。（自衛隊は、装備からみれば立派な軍隊であるが、憲法上は軍隊でないため警察と同様に通常の国内法に拘束されるうえ、国外で行動することもできない。）冷戦下、日本がアメリカに無断で独自に行動する余地（たとえば、ソ連や中国と接近したり、講和条約を結んだりする選択肢）は、事実上存在しなかった。そのため、戦後の約25年間、日本の対中国政策はないも同然だった。

*

1971年キッシンジャー国務長官が訪中し、翌年にはニクソン大統領の訪中が実現する。アメリカの支持により、中国は国連の代表権を獲得した。米中関係の改善は、冷戦の力学のなかで生じたものであるが、ポスト冷戦の、90年代以降の世界でも大きな意味を持つことになった。

アメリカは、中国との関係を改善することで、当面の敵・ソ連を牽制しつつ、東アジアの安定をはかることができた。中国は、アメリカとの関係を改善することで、自国の安全

保障と将来の発展への布石を打つことができた。双方の思惑が合致したこの歴史的和解によって、1979年に始まる中国の改革開放政策のための客観的条件が整えられた。

日本の「頭越し」の米中合意は、日本を当惑させたが、同時に日本側に大きな日中国交回復への意欲を生み出した。1971年に決まった沖縄返還に続いて、残された戦後処理の最大の懸案であり、日本の国際社会への復帰を完成させるうえでどうしても必要な関門だった。（副島隆彦氏は、沖縄の「核抜き本土並み返還」が、中国に対するサインになり、米中合意に結びついたと指摘している。）日本が中国に、借款や技術供与などの経済支援を行なうことは、米中合意が当然に意味するところであった。

日中の国交正常化は、日中間の戦後処理を含む。日本の政治責任（満洲事変から日華事変にいたる侵略行為に対する責任）は、東京裁判によってすでに裁かれ、決着していた。

（東京裁判には中華民国が参加した。中華人民共和国はまだ成立していなかった。）国家賠償については、蒋介石が請求権を放棄することを宣言しており、いっさい行なわれていなかった。北京の中国政府も、同様のことを確認した。歴史認識については、日本は謝罪と反省を表明し、平和条約が締結されたことで決着したかたちになっている。しかし、中国側の不信は根強く、その後もことあるごとに蒸し返されている。台湾問題については、日本が領有権を放棄したことははっきりしているが、アメリカが台湾の帰属は「未決」という態度をとっていることもあり、あいまいな部分が残った。

西側との関係改善は、その後の中国の進路を変え、中国共産党の性格を変える大きな選択であったと言える。この結果、中国はベルリンの壁の崩壊より10年早く、改革開放政策をとることができ、その成果によってポスト冷戦世界に生き延びたのである。

ポスト冷戦と、21世紀の日中関係

中国共産党は、ひとくちで言うなら、ナショナリズムと中国近代化のための政党であると言うことができる。

このように言うなら、国民党もまた、ナショナリズムと近代化と革命のための政党であった。だから国民党と共産党は、競合したのだ。

では、両者の違いはどこにあったか。それは、農民に対する態度の違い、農民の負担において近代化を実行するかどうかの違いだったと言える。共産党は土地の再分配を掲げ、農民の支持を集めた。国民党は、外国からの豊富な援助にもかかわらず、敗れた。

中国共産党の権威、中華人民共和国の正統性は、したがって、中国のナショナリズムと

近代化を十分に達成したかどうかにかかっている。社会主義は、そのための手段にすぎない。抗日戦争に勝利し、外国勢力を駆逐したことで、ナショナリズムは一定の成果を収めた。近代化をはかるため、はじめはソ連の支援、ついで自力更生をめざしたが、どちらもうまく行かず（そして、農民の負担を求める点では変わりがなく）、最後は改革開放、すなわち西側外資の導入による発展という路線にたどりつく。

外国の資本・技術を導入して経済発展をはかるなら、たしかにそのぶん、国内の蓄積は不要になり、農民の負担は軽くなる。けれどもそれには、外国（アメリカ）との良好な関係が必要になる。また、国内経済を市場メカニズムによって運用するという必要も生まれる。すなわち、改革開放経済を推し進めることで、中国共産党は、国民党と本質的な違いがなくなっていく。

*

中国のこうした変化は、対日戦争を戦ったアメリカの戦争目的が、半世紀を経て達成されつつあるということを意味する。中国の自由主義経済化、民主化は、アメリカの究極の政策目標であり国益である。

いっぽうアメリカとの関係改善を決断した中国も、国際社会を十分視野に収めている。当初の動機は、ソ連の軍事的圧力に対抗するため、国際社会の支援（アメリカとの同盟関係）を後ろ楯にするというものだった。これは、日本の軍事的圧力に対抗するため、国際社会の支援（アメリカとの同盟関係）を求めたのと、同じ構造である。中国こそ、国際社会のパワーゲームによって翻弄され続けた国である。中国がみずからの経済発展を、国際社会の勢力均衡のうえに築こうとするのは当然だ。

改革開放政策のもと、無尽蔵の可能性を秘めた中国市場に、誰が参入するか。中国はそこに、かつてワシントン体制がうたった門戸開放・機会均等の原則、すなわち、各国のバランスを重視しようとする。各国を互いに競わせ、牽制させることで、中国が主導権を発揮できる。そのことを担保するのが、アメリカのプレゼンス（東アジア政策）である。ここに、戦前期の国際政治の力学と同様の構図があると言えよう。

日本は、地政学的な理由から、中国市場に大きな魅力を感じている。しかし日本が、中国市場に深入りし、独占的な結びつきを強めてしまうことは、中国にとっても、アメリカにとっても、そしておそらく日本自身にとっても、望ましくないだろう。中国は、日本の再軍備を一貫して警戒しており、この点から、日米安保条約に利益を見出している。また日中間には、過去の歴史について感情的なしこりが残っており、アメリカから見ると、こ

れが日本の対中接近を阻む安全弁になっている。(これは、北方領土問題が日本の対ソ接近を阻んだ構造と似ている。)さらに日本は、安全保障に関しても、経済に関しても、アメリカにあまりに依存しており、これを犠牲にして中国に接近することは国益に反する。これらの要因によって、日米中の当面のバランスが保たれている。

*

中長期的にみると、しかし、東アジアをめぐる各国間のバランスは必ずしも安定したものではない。

まず第一に、経済の実勢が刻々と変動している。90年代足踏みを続けた日本経済に対して、中国は相変わらず10%前後の経済成長を続けており、年々先進工業諸国との差を詰めている。90年代のアメリカは好況を続けたが、これが長期的に続くとは考えられない。アジア金融危機は、東アジア経済に打撃を与え、中国経済の足下を脅かした。特に近年、日本の対中投資余力がなくなっていることが注目される。

第二に、中国国内体制の先行き。改革開放は新たな段階を迎え、国営企業の整理が日程にのぼっている。従来の支持基盤を解体するいっぽう、新たな支持基盤の形成に失敗すれば、共産党の一元支配が危うくなる。

第三に、東アジア周辺の安全保障問題。この地域は北朝鮮や台湾海峡といった、不安定な紛争の種を抱えている。これ以外にも、中国の国内体制の先行きと絡んで、目の離せない紛争要因が多い。

アメリカが日米安保ガイドラインの改訂を積極的に進めているのも、こうした不安定要因をにらんだ対中政策の一環と考えることができる。北朝鮮が核兵器、ミサイルの開発を進めているため、朝鮮有事は日本など周辺にも波及する。ガイドラインは表向き、朝鮮有事に備えるということになっている。しかし、自衛隊が米軍と一体となって、日本の領土外で極東有事に対処する作戦行動をとるというガイドラインの本質に照らせば、これが台湾有事に適用できることは明かだ。日本は当面、アメリカの戦略に同調し、アメリカのプレゼンスを東アジアにつなぎとめるのが得策である。

*

21世紀前半の日中関係は、いくつかの点で過去と異なるものとなろう。

第一に、東アジアは、20世紀前半のころのような、世界の他の部分から相対的に隔絶した地域ではなく、世界と緊密に一体化している。この地域の当事者だけが、東アジアの運命を決定することはできない。

第二に、日本と中国の構造的な相補性がこの地域の基軸となるということ。伝統中国を中心とする夏夷秩序とも、近代日本を中心とする東亜新秩序とも、冷戦時代の分断とも異なった、日中両国の対等な関係がはじめて出現する。ただしその関係は跛行的であり、中国は政治・軍事大国として、日本は経済大国として、相互を補完しあう。そして、両国の矛盾をアメリカのプレゼンスが吸収する。

第三に、日本、中国、周辺諸国を合計したこの地域の経済力が、現在のアメリカに匹敵する巨大なシェアを占めるであろうということ。東アジアは、国際情勢から影響を受けるだけでなく、国際社会のあり方を規定する主要な構成要因となる。すなわち、中国の行動様式がこれまで以上に、国際社会により大きな影響を与えることとなろう。

日本の役割は、こうした来るべき変化を見通して、アメリカと中国の良好な関係を創出すべく、賢明に行動することである。日本の悪夢は、アメリカと中国が争うこと、そしてアメリカと中国が手を握ることである、と言われてきた。前者は文字通りの悪夢だが、後者は望ましいことに違いない。中国とアメリカは、世界の覇権国家であり、日本はそうではない。日本の安全と国益、そして世界の利益が、米中の安定した関係にかかっている。日中関係の歴史を回顧することは、将来に向けたこのような日本の役割をより深く理解することにもつながるであろう。

文献

- | | | |
|--------------------|---------|--|
| 秦 郁彦 | 1984 | 『昭和天皇五つの決断』講談社 →1994 文春文庫 |
| 秦 郁彦 | 1986 | 『南京事件——「虐殺」の構造』中央公論社 |
| 猪瀬 直樹 | 1983 | 『昭和16年夏の敗戦——総力戦研究所“模擬内閣”の日米戦必敗の予測』世界文化社 →1986 文春文庫 |
| Irie, Akira (入江 昭) | 1987 | <i>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Asia and the Pacific</i> , Longman. =1991 篠原初枝訳『太平洋戦争の起源』東京大学出版会 |
| 加藤 典洋 | 1997 | 『敗戦後論』講談社 |
| 小林よしのり | 1998 | 『新ゴーマニズム宣言 戦争論』小学館 (傲慢主義) |
| 小林よしのり・竹田青嗣・橋爪大三郎 | 1997 | 『正義・戦争・国家論』径書房 |
| 小堀桂一郎 | 1997 | 『靖国神社と日本人』PHP新書 |
| 児島 襄 | 1980-81 | 『天皇 I~V』文春文庫 |
| 小室 直樹・色摩 力夫 | 1993 | 『国民のための戦争と平和の法』総合法令 |
| 森村 誠一 | 1983 | 『新版 悪魔の飽食——日本細菌戦部隊の恐怖の実像』角川文庫 |
| 大江志乃夫 | 1985 | 『日本の参謀本部』中央公論社 |
| 大江志乃夫 | 1998 | 『東アジア史としての日清戦争』立風書房 |
| 岡田 英弘 | 1996 | 『台湾の命運』弓立社 |
| 田中 正明 | 1963 | 『パール博士の日本無罪論』慧文社 →1989 増補改訂 |
| 副島 隆彦 | 1997 | 『属国日本論』PHP研究所 |

文献

- 秦 郁彦 1984 『昭和天皇五つの決断』講談社 →1994 文春文庫
- 秦 郁彦 1986 『南京事件——「虐殺」の構造』中央公論社
- 猪瀬 直樹 1983 『昭和16年夏の敗戦——総力戦研究所“模擬内閣”の日米戦必敗の予測』世界文化社 →1986 文春文庫
- Irie, Akira (入江 昭) 1987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Longman. =1991 篠原初枝訳『太平洋戦争の起源』東京大学出版会
- 加藤 典洋 1997 『敗戦後論』講談社
- 小林よしのり 1998 『新ゴーマニズム宣言 戦争論』小学館 (傲慢主義)
- 小林よしのり・竹田青嗣・橋爪大三郎 1997 『正義・戦争・国家論』径書房
- 小堀桂一郎 1997 『靖国神社と日本人』PHP新書
- 児島 襄 1980-81 『天皇 I～V』文春文庫
- 小室 直樹・色摩 力夫 1993 『国民のための戦争と平和の法』総合法令
- 森村 誠一 1983 『新版 悪魔の飽食——日本細菌戦部隊の恐怖の実像』角川文庫
- 大江志乃夫 1985 『日本の参謀本部』中央公論社
- 大江志乃夫 1998 『東アジア史としての日清戦争』立風書房
- 岡田 英弘 1996 『台湾の命運』弓立社
- 田中 正明 1963 『パール博士の日本無罪論』慧文社 →1989 増補改訂
- 副島 隆彦 1997 『属国日本論』PHP研究所